

CHENQUBING YANJIU

陈去病研究

赵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CHENQUBING YANJIU

陈去病研究

赵霞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去病研究 / 赵霞著. -- 保定 :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666-0327-2

I. ①陈… II. ①赵… III. ①陈去病 (1874 ~ 1933)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9960号

责任编辑: 杨显硕

装帧设计: 王占梅

责任印制: 靳云飞

出版: 河北大学出版社 (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 1 / 16 (710mm × 1000mm)

字数: 252千字

印张: 13

版次: 2013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66-0327-2

定价: 28.00元

序

2009年赵霞考上了博士,我和她讨论博士论文题目,她应该说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于是我建议以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为研究课题。这种选择,基于几种考虑:一是对于年轻博士而言,作家研究是一种比较保险、操作性强的选择。小处着眼,按部就班,总能有所收获。二是出于我本人对陈去病的熟悉。我在撰写《南社研究》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有关南社的文献,其中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的诗文集更是阅读的重点,但是最终没能撰写出关于他们的专门性研究文字,这其中固然与体例、完稿时间等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有些问题我尚未梳理清楚,因此期望借助青年人的热情和才华,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三是陈去病研究的价值。长期来,关于南社研究的话语权几乎掌握在柳亚子那里,后世的评说,基本上是看柳亚子的眼色。比如关于南社三个创始人,高旭有参加贿选的丑事,柳亚子与之割席;陈去病因支持西山会议,被柳亚子称为一民主义,因此他们都是有瑕疵的,都有过“反动经历”,都遭到了后世学术研究的冷遇。

陈、高、柳都是典型的文人,喜欢舞文弄墨,喜欢名士风流,诗文数量相当可观,人生经历丰富多变,他们又生活在社会转型期,身上聚集着很鲜明生动的特定时代的文化信息。柳亚子研究的人不少,我们如果要获取对柳亚子进一步的认识,必须要通过对他相关人的研究来推进。高旭研究也是不错的课题,但是赵霞的一个师兄已经做过硕士论文。更重要的原因,是陈去病相对而言,他沉潜、执着,有较明确的学术追求;他急公好义,勇于担当,无愧于“去病”的名号;他为人宽厚随和,又是动荡年代革命风潮的弄潮儿。在他身上,有更多的文化选择的复杂性,例如在南社内讧中,他既与柳亚子的反对者有很好的关系,又签名支持柳亚子;他既参加湘籍的活动,又是新南社中的人。再比如他和柳亚子的关系,虽然从名辈上他是柳亚子的前辈,但是很长时间他们如兄弟般和谐相处;后来因为柳亚子排挤陈、高,很长时间他们处于淡然的状态;20年代前后他们又有较多的喝酒、文字交往,其中有很

多悬疑,尚待通过资料得到解读。

陈去病是否一民主义者,也是值得重新认识的。我们不可否认陈去病的诗文中“汉家宫阙”“汉唐衣冠”等表示民族主义的词汇。用民族主义煽动反清排满是当时革命派的一种宣传策略,当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以后,革命派基本上就抛弃了这种套路,陈去病也是如此,辛亥后,他的《浩歌堂诗钞》就不再有类似的表述。如果他真是一民主义者,辛亥后,政权回到了汉族手里,就应该偃旗息鼓。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陈去病追随孙中山,并与孙中山建立了超越领袖与下属关系的友情,他参加二次革命、北伐,身体力行,践行着对于民主共和的追求。较之柳亚子、高旭,陈去病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重,其中一个表现是他一生热衷于“残明遗献”的整理。一个人的学术志趣与柳亚子所说的一民主义不应该有关系,柳亚子一生的学术归宿不也是《南明史》吗?当代不是也有人一生致力于南明文学历史的研究吗?

陈去病作为南社的发起人,他的诗、文有相当的功力,不论是传统诗体还是四六骈文,都写得气韵沉厚,情文并茂,他写的《南社诗文词选序》几乎是南社在政治、文学、文化、社团风格多方面的灵魂。他创办了近代最有影响的戏曲期刊《二十世纪大舞台》,尝试戏曲创作,对近代戏曲变革影响甚巨;他还尝试写作小说《莽男儿》。可见在清末民初的文坛,陈去病的活跃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政治活动。

确定题目后,陈去病外哲嗣张夷主持的《陈去病全集》整理出版,为赵霞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赵霞从未步入社会,一身的学生范儿,从此如同读高中、读大学一样沉潜到关于陈去病的资料之中。三年时间,她如期完成了博士学业,也完成了关于陈去病的研究。赵霞的陈去病研究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其开创性。很长时间内南社研究在学术界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它既不如古代作家那样遵循古训,有其相对成熟的承传体系,激发研究者古雅高妙审美境界的快感;也不如五四后新派作家先锋新锐,让研究者无形中生出一种登高俯瞰的自豪。南社则处于新不新旧不旧的状态,哪方面都处于半瓶子不满一瓶子晃荡,让研究者有不能肆意挥洒的感觉。南社领袖人物长期来不被深入研究,这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赵霞是第一个对陈去病系统全面梳理,并进行条分缕析研究的。陈去病的思想历程、革命生涯、社团活动、文学成就等,这一本《陈去病研究》做了完整的呈现。

其次,《陈去病研究》是历史人物传论式结构,这种结构有易于操作的一面,但是作者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学术视野,很容易变成年谱式的流水账。赵霞采用了专题式论述,纵横结合,每一个论题从一个角度切入,同时联系相关问题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仅考察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以及内在构成,而且分析其与具体背景的关系。作者的专题研究,吉光片羽,常有动人之处。如作者在梳理陈去病创办新型学

堂的经历时,首先对清末民初学制变迁进行了回顾,特别是对女学兴起的叙述,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不仅增加了论著视野的广阔与内容的厚重,也让读者能清楚地认识到陈去病在历史场景中的角色。

当然,赵霞的这篇论著,还有不少有待于深化与拓展的内容,她一路顺风顺水念完博士,有的是时间、才华,可以慢慢提炼打磨,但是形势比人强,学术界期待着这第一种陈去病研究。不过,赵霞立志治学,她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完善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在学术事业中不断磨练提高自己。我作为她的指导老师,祝贺她的大作面世,也期待着她在学术事业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孙之梅于济南

2013年7月10日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4)
第一节 陈去病家乡的整体环境及特点	(4)
一、教育发达 名士辈出	(5)
二、民族思想和遗民情结的根深蒂固	(6)
三、集会结社传统	(7)
第二节 陈去病的家庭背景	(9)
第三节 陈去病的生平经历	(10)
一、政治活动	(11)
二、任教经历	(15)
第二章 陈去病的文化活动	(18)
第一节 文献整理活动	(19)
一、明遗民、反清志士文献	(21)
二、清史文献	(27)
三、乡邦文献	(30)
四、陈氏文献整理的意义及影响	(36)
第二节 文化实业活动	(37)
一、创办报纸	(38)
(一)《二十世纪大舞台》始末	(38)
(二)晚清戏剧改良运动及《二十世纪大舞台》所扮演的角色	(41)
二、创建学校	(48)
第三节 陈去病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	(54)

第三章 南社与其他社团的组织	(58)
第一节 明清社团发展概观	(58)
第二节 南社之前陈去病发起的社团组织	(63)
一、黄社	(64)
二、神交社	(66)
三、秋社与匡社	(68)
第三节 陈去病与南社	(69)
一、南社的酝酿与发起	(70)
二、陈去病参加的南社活动	(75)
三、陈去病与南社成员的交往	(77)
(一)陈去病与柳亚子	(77)
(二)陈去病与徐自华	(81)
(三)陈去病与苏曼殊	(85)
四、陈去病在南社余绪中介于新旧之间	(91)
(一)新南社	(91)
(二)岁寒社	(93)
(三)南社湘集	(94)
五、南社之于陈去病的意义	(96)
六、陈去病之于南社的意义	(100)
第四节 陈去病社团组织的特点及得失评说	(103)
第四章 陈去病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	(108)
第一节 陈去病的诗歌理论	(108)
一、保持文学的独立品格及文品与人品的统一	(109)
二、推崇诗歌的社会功用性与传统诗教	(110)
三、“诗以异为体”与创新精神的倡导	(112)
四、诗歌创作主张中的适度原则	(114)
第二节 陈去病的诗歌创作	(117)
一、陈去病诗歌的分类解析	(118)
(一)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振臂高呼	(118)
(二)行者过客笔下的风土人情	(122)
(三)时代风雨里的穷愁之思	(125)
二、陈去病诗歌的艺术特色	(129)

(一)以文为诗与说理成分的增加	(129)
(二)风格多样与暗指的大量运用	(134)
(三)手法繁多与联想丰富	(140)
(四)对诗歌传统的承袭与韩愈的巨大影响	(143)
第五章 陈去病的新旧体文章及其他	(150)
第一节 近代文坛概观:新旧文体的对立与渗透	(150)
一、新文体	(151)
二、旧文体	(154)
三、新旧文体的对立与渗透	(157)
第二节 陈去病的新文体散文创作	(158)
一、报章体政论文	(158)
二、演说体白话文	(163)
第三节 陈去病的传统骈散文理论及创作	(164)
一、陈去病的古文理论	(164)
二、陈去病古文创作的分类解析	(167)
(一)传记类	(167)
(二)游记类	(169)
(三)序跋类	(172)
三、陈去病的骈文创作	(173)
第四节 陈去病的小说戏曲创作	(175)
一、陈去病的小说创作:《莽男儿》与中国近代侠文化	(176)
(一)中国侠文化的渊源流传	(176)
(二)近代侠文化的突变	(178)
(三)《莽男儿》中蕴含的侠义精神	(179)
二、陈去病的戏曲创作:蕴含崭新元素的有益尝试	(180)
结语	(183)
一、文学上的追求实用	(184)
二、精神上的遗民认同	(186)
参考文献	(189)
后记	(196)

绪 论

陈去病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名人、诗人、学者，具有多重身份，经历复杂。他出生于人文精神荟萃的江苏吴江地区，地域文化对其影响深远，又恰逢清末动荡，社会形态、民众心态与信仰党派等众多方面面临着全盘颠覆，基于此，陈去病早年曾有过维新思想，短暂的留日经历之后思想转而激进，晚年面临民国失控局面时政治立场又曾摇摆不定。

作为政治活动家，陈去病与国民党政要关系密切，曾为民族革命奔走疾呼，他以文学为工具，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整理遗民和清史文献，旨在激化民族矛盾，达到革命目的，又受到地方自治等社会思潮的影响，整理乡邦文献贯穿他的一生，人到晚年的陈去病回忆起来文献整理这一举动，言语中仍不乏得意之词：“惟历年搜集乡先生诗文词曲日益繁富，又考订纪述等类，亦动盈几案”（《与宋紫佩书》）。

作为文化名人，陈去病做了诸多文化实业活动，创办学校、报刊，倡导革命思想，其中包括与汪笑侬合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这是中国第一种以戏剧和系统的戏曲理论为对象的报纸，是对戏剧改良运动的理论探索，虽然只刊发两期，然而正是陈去病等创办者率先为戏曲搭建起媒体的平台，将理论宣传与实际的舞台演出相结合，使《二十世纪大舞台》在近代戏曲改良运动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陈去病可谓功不可没。陈去病积极组织社团活动，其中最富盛名者莫过于南社，作为南社的领袖之一，他在南社精神层面上的把握和指导，南社政治地位的提升以及提携后进等方面贡献突出。而南社对于陈去病也有着重要的反作用，辛亥革命之前，南社对于他这样一位革命者，有着特殊的目的，他希望南社在重现几复风流的基础上承载更多的实际意义。但当民国建立之后，形势一变再变，脚步有些慌乱的陈去病又急需找寻到文化上的归依与个人情感的寄托，此时已成为历史的南社则再次成为了载体。可以说，不仅陈去病可以称之为南社及南社精神和情感上的代表，南社也成为了陈去病精神生活的一种象征，是他前期精神层面上“姿态”的延续，更

是后期个人“笃旧”情怀的寄托。

作为学者,陈去病一生不仅在多所学校任教,且创作作品甚丰,种类驳杂,尤以诗文见长,于文学理论等方面亦有独到见解。陈去病在诗学主张方面,既包孕有追溯传统、呼唤诗学精神的回归,对于诗歌功用性的重视,同时又主张创新精神的光大,在对待学养、才情的态度上把持着难得一见的平衡与适度原则。而其诗歌创作从整体上呈现出的是苍凉沉郁的风格,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其对于中国诗歌传统精神内核的承袭,同时在整体风貌上又渗透着传统诗歌创作中特有的忧患意识。在近代特殊的大背景下,陈去病的文章创作可以分为新文体与传统骈散文两大部分,前者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同时在呼吁民众宣传革命方面担当重任,也为陈去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而后者则更能体现他的传统文人本色,从中亦可窥见近代新旧文体的并存现状,以及互相的影响与渗透。

由于时代和个性使然,陈去病也有着自身的缺点,这一点无须讳言。他过于急功近利地发掘文学的工具性,以政治主张得到实现为最终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同时也使得其在社团组织、文化实业方面多有虎头蛇尾之举。陈去病的一系列问题在当时的革命先行者身上也极具代表性,许多与他年代相同、立场一致的革命家文人走过的道路和陈去病惊人的相似,弱点也如出一辙,从这个角度看,陈去病的个体性研究也同样带有群体性特征。

综上,以大背景下的个案研究为切入点,对陈去病做系统、全面的研究,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清末民初,以陈为代表的这一部分有着多重身份的文人创作心态以及思想情感的变化,因此有其研究价值和意义。

目前,国内对于陈去病的集中研究非常薄弱,由于陈去病的大量作品散见于各地报纸期刊,且使用不同笔名发表,因此受到收集材料等方面的影响,现阶段仅仅是将其各种作品集结出版,还处于基础的作品整理阶段,而作品集也是近期才相继出现,目前搜集作品比较齐全的是张夷主编的《陈去病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另有《陈去病诗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等,尚没有专门研究陈去病的专著出现。

学术论著涉及陈去病的大多是因南社而提及,陈去病作为南社发起人之一和精神领袖,在叙述南社历史或从社团史角度解析南社的专著中都会涉及,包括他所做的社团发起组织工作、文学交游活动等方面,这类专著以杨天石、刘彦成《南社》和杨天石《南社史长编》为代表。此外,有众多回忆性的关于南社的文史资料中对陈去病也有涉及,包括马以君主编《南社研究》(共7册),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张夷主编《南社钩沉》等。

南社近十年来研究成果颇丰,多从宏观角度,将南社置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作整体研究,以孙之梅老师《南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卢文芸老师《变革与局限——南社文化论》及台湾师范大学林香伶老师《清末民初文学转型期的标志——南社文学研究》为代表,其中陈去病作为个体,所提不多。近几年来,南社研究逐渐走向文体细化和地域区划,出现了南社词等专门的分体文学研究以及南社诗人的地域化研究,如南开大学汪梦川博士学位论文《南社词人研究》,苏州大学孙立新博士学位论文《南社苏州诗人研究》等,陈去病所占篇幅亦有限。

单篇论文方面,涉及到陈去病的数量不多,且其中大多数只是局限于某一点的分析,如着眼于陈去病的诗歌艺术特色(《绿玉青瑶曾浩歌——南社诗人陈去病简论》,《苏州大学学报》),或者着力分析陈去病与孙中山或南社社友的关系(《“十年袍泽,患难同尝”——陈去病与孙中山的友谊》,《南京理工大学学报》;《柳亚子与陈去病》,《铁道师院学报》),再或者涉及到陈去病后期的政治主张等方面(《西山会议前后的陈去病》,《钟山风雨》),角度各异,且有文学、历史考证等不同方面的侧重点,但均不够全面,因此对于这样一位民国要人仍然缺乏系统的整合性研究。

本书着力于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全面系统地对陈去病一生的经历,包括社会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等方面作出梳理;二是着重理清陈去病与南社的关系,以陈氏的角度解析南社,并对陈氏性格的典型意义做深层原因探究;三是着眼于陈去病的诗文创作,以其作品为基础性资料,结合民国时期文化观,将个案研究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深入探讨。最终试图在解决上述问题之后能够还原一位真实的陈去病,并对其作出合理评价。

第一章 家世与生平

陈去病，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活动家、革命家、诗人、学者，原名庆林，字佩忍，又字巢南、病倩，别名垂虹亭长，笔名有季子、醒狮、大哀、南史氏等，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1874年出生于苏州市娄门内平江路庆林桥旅次，为遗腹子。陈去病自幼为吴地文化浸染，得母亲悉心教养，早年虽得中功名，然始终“倡言革命”，1903年东渡日本，思想发生巨大转变，1904年于上海创办《二十世纪大舞台》，开戏剧改良与舞台实践相结合之先声，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自此正式举起革命义旗。陈去病擅长利用文字作利器，于辛亥革命前先后辑录、编纂《陆沉丛书》、《清秘史》、《明遗民录》、《奴祸溯源》等多部作品，意在激励民众，取得民族革命的舆论支持。1909年11月13日与柳亚子、高旭于苏州虎丘创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学社团——南社，并在诗文创作及提携后进等方面成绩斐然。辛亥革命后陈去病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反袁专政的“二次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并担任讨袁军司令部秘书长、非常国会参议院秘书长等重要政治职务。晚年潜心教育，于东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任教，后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并主编有《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1933年病逝故里，享年六十岁。陈去病一生著作甚丰，除诗集、专著外，作品大量刊登于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体裁各异，题材繁多，主要作品有《浩歌堂诗钞》、《浩歌堂诗续钞》、《诗学纲要》、《辞赋学纲要》等，并整理辑录《松陵文集》、《笠泽词征》等乡邦文献，今人整理出版的主要有《陈去病诗文集》、《陈去病全集》等。

第一节 陈去病家乡的整体环境及特点

陈去病为江苏吴江县同里镇人，吴江古称松江，别称鲈乡，历史悠久，于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建县，县治设松陵，属苏州，元元贞二年(1296年)吴江县升为州，明

洪武元年(1369年)复为县,清雍正四年(1726年)分吴江为震泽县和吴江县,1912年吴江、震泽两县复合为吴江县,隶属江苏都督府。同里则始建于宋代,宋末元初时成镇,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同里旧称“富士”,唐初改为“铜里”,宋时将旧名拆字为“同里”,同里镇位于太湖之畔古运河之东,距离吴江县治十余里,距苏州府城二十公里,镇外四面环水,被江、河、湖、荡层层包围,镇内则由数十条河流分割为若干小岛,以桥相通,可谓家家临水,户户通舟。由于同里位于叶泽、同里、南星、九里、庞山等五湖中心,河网密布,便利的水上交通和周边地区丰富的物产极大地促进了同里的经济繁荣,这个富庶的江南古镇在明清时期已经是“当时吴江县东南米业、棉布业、造船业和竹器业的中心,成为长江三角洲市镇网络的一个重要环节”^①。经济的发达也成为了当地文化发展的基石,从而使同里呈现出独有的人文特点。

一、教育发达 名士辈出

同里“自古遵朴素,尚文学,多诗礼之家,比他镇为蔚,自宋迄今,故科第不绝,儒风不衰”^②,自宋元以来,同里所出名门望族尤多,经济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若干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化群体,并以这些文化群体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促进了教育与举业的观念在当地的深入人心。

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经济条件良好的望族往往不惜财力,聘请名师教育子弟,“学而优则仕”在当时被视为正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名门子弟在仕途上的成功,同样有助于巩固望族的地位,从而给予家庭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保障,而这种保障更加推动了望族培养后辈子弟的决心,同时加大教育的投入,由此形成一个以经济促教育、以教育保经济的良性循环,因此同里的名门望族之中不乏儒者雅士,而这类儒士大夫往往文质彬彬,待人谦恭,谨承“达则兼济天下”之志,乐善好施,致使“功业声光为时所尚”^③,潜移默化的影响毋庸置疑。在江南地区大环境与望族发展教育观念的双重推动下,同里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自宋元以来,儒士大夫彬彬辈出,虽蕞尔地,无异通邑大都焉”^④,自南宋淳佑四年(1247年)至清末,仅同里镇便出过一位状元,进士举人百三十余人,可谓名副其实的文化古镇。陈去病自幼生活于此,耳濡目染,家乡的文化熏陶奠定了他文人的气质,而对吴地名士品行

① 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② 嘉庆《同里志》卷六,《典制志·风俗》。

③ 嘉庆《同里志》,《同里先哲志·天顺元年丁丑孟冬里人吴骥书序》。

④ 嘉庆《同里志》,《嘉庆十六年仲夏司里巡检钱江陈锡华序》。

节操的敬仰也成为了他贯穿始终的整理乡邦文献行为的最原始动力。

二、民族思想和遗民情结的根深蒂固

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同里乃至整个江南地区都有着深刻的民族观念和特有的遗民情结。“遗民情结”的提出始于孙之梅的《南社研究》,特指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南社诗人们为现实的政体革命、种族革命寻求历史支援时,文化类别的认同”^①,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南社诗人的诗歌创作之中,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有着明确的时间界定与参与主体的囊括范围。在此所谓的“遗民情结”则与《南社研究》中的界定不尽相同,这里更多指代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同,它源于儒家思想中“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因此相对宽泛,参与主体也可扩大至整个地区民众,后文中出现的“遗民情结”均与此作同一理解,陈去病对这种情感有极为精当的理解:“吾侪所以崇拜遗民者,谓其感戴旧君,耻臣新主也”^②。同时此处的遗民情结当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观念加以区别,二者内涵并不完全等同,后者更加地有针对性,对于外来民族的排斥和自有民族的强烈认同是民族观念具体的表现形式。在民族思想和遗民情结的共同影响下,每遇朝代更迭,尤其是异族入主中原,这两种观念便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力,每到此时对这一地区而言都不啻为一场浩劫,以宋末元初和明末清初最具有代表性,而主观上由于文化传统的定型和观念的日趋成熟,客观上则由于清廷恩威并施,比元统治者更加讲求策略,因此在明清之交时,这两种观念显得尤为突出。

在明末抗清斗争中,江南地区反抗尤其激烈,清兵对于这片富饶之地打压甚重,1645年为平定东南,更是先后造成“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案,尽管学者对前者的真实性仍有质疑之声,但武力征服所造成的惨痛结果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忠臣良将“或百战捐生,或孤城效死,虽将倾之厦,一木难支,而毅魄英魂自足千古”^③,普通民众亦誓死反抗,依靠地利优势,“于朱泾、四保江等处揭竿联寨,出没无定”^④,致使“湖道梗塞,久与官军持”^⑤,并因此出现了吴易等诸多吴江籍的抗清志士,为陈去病所敬仰。

① 孙之梅:《南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1页。

② 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明遗民录·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98页。

③ (清)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御制题胜朝殉节诸臣录(并序)》,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④ (清)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 勘本》卷二十八,《太湖、浙西义兵列传》第二十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⑤ (清)温睿临、李瑶:《南疆绎史 勘本》卷二十八,《太湖、浙西义兵列传》第二十二,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如果说民族观念更直观地反映在易代时的硝烟炮火之中,遗民情结则更多地是一种冷静的退避和拒不合作的态度,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更长久的坚持。陈去病在谈及先祖于宋元交替之时,“不屑仕宦”的理由时便充满了自豪感:“吾祖耻于变节,故不惮奔窜,为觅桃源”^①,因此“自兰溪来迁于吴”^②,而吴地便成为了陈氏先祖寻找到的一片精神和文化上的净土。可见在江南地区,因耻于变节拒不与新朝合作而甘当遗民的传统由来已久。

清朝伊始,清廷为奴化思想,文化政策异常严酷,这对于长期生活在明末宽松的文化氛围中的江南文人而言,巨大的反差更强烈地激起了他们的不满。而其后清廷所采取的一系列诸如开博学鸿儒科等意在拉拢天下文人的举动,则更有诛心之嫌,对于这种文化渗透式的征服,同里的儒绅士大夫果断地选择了“处而隐则能守志,励操昭范后人”^③,这种选择本身也能体现出当地的一种相对一致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的背后正是源于深刻的遗民情结。陈去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民族主义,不惜表现过分明而遭人批评,主张儒生君子当“出而簪仕,则攘斥胡虏,扶植神皋;处而隐野,则纲纪群伦,立彰风教。虽际沦亡,亦不以淫威而屈其节”^④,同时花费大量精力物力整理遗民文献,家乡的民族观念和遗民情结的影响显而易见。

三、集会结社传统

“集会”一词最早出于《史记·乐书》:“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互讲习读之”。可见最初集会的目的是在知识上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后世的集会逐渐演变成了文人们的一种艺术化的文化生活,集会往往会选择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突出其意义,参与集会的文人追求闲适和雅致的形式,并在不动声色之间比拼才学,虽有逞才之弊,却也对提高诗艺有所帮助。雅集在东晋时期达到了顶峰,并为后世所效仿,唐之后各朝均有文人集会的传统和所作诗篇的记载。早期的文人集会,参与者通常有亲缘关系,亦或彼此相熟,再或者是呈现以家族为单位而向四周辐射的形式。同里有着千年文化的熏陶,同时名门望族之中又不乏能诗善赋之人,因此在集会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重九日,里人携朋载酒,或登西舫庵涤虑楼,或登罗星洲酒仙阁,拈题分韵,各成诗篇,竟日始散,有古人龙山嘉会

① 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蜃江陈氏家谱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② 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蜃江陈氏家谱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

③ 嘉庆《同里志》,《同里先哲志·天顺元年丁丑孟冬里人吴骥书序》。

④ 嘉庆《同里志》卷六《典制志·风俗》。

之遗风焉。”^①从上述记载中不难看出,同里的集会参与人数众多,形式自由,更多追求的是相聚的乐趣而非强逞才学,而这种集会已经作为风俗沿袭,足以见当地集会传统由来已久。

结社与集会有所不同,结社兴起时间较晚,组织相对完整,结构较为严谨,有着相对固定的参与成员,结社的基础不仅限于家族、亲缘范围,而是有了更广泛的包容性。自南宋以来,统治者重文轻武思想日趋严重,文人在地位提高的同时增强了群体意识,如果说集会的一部分目的在于炫耀才学,更强调的是创作与自我,结社则开始关注群体需求与社员间的互动,而结社的原因则更为多样化,不再限于创作,即使文人结社也仅需要部分观念上的志同道合而已。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结社是将集会正规化的行为,同时集会也成为了社友组织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结社行为在明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文人群体意识空前高涨,据史学家统计,明代有近二百个文人社团,尤以东南地区文人结社之风最盛,至明中期,“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履无虚日,酒酣以往,笔墨横飞”^②。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组织复社也于明崇祯二年(1629年)成立,由于复社所处时代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因此复社成员大都怀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摒弃空谈之风,关注现实并实际参与政治斗争,复社的成立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吴江地区的结社传统,也给结社行为本身赋予了更加鲜明的政治意义,从而给予了社团更多的表现内涵。

明亡之后,吴江地区社团活动一如当地的抗清斗争,依旧活跃,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打压,形式更加具有隐蔽性,且呈现出“遗民社团”的特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顾炎武、归庄参与的惊隐诗社,又称逃社,这种名称本身便反映出身处时代夹缝中的文人惶恐而又无所适从的心态。据清代县志记载,“国初,吾邑之高蹈而能文者,相率为惊隐诗社,四方同志咸集……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逖迹林泉,优游文酒,芒鞋箬笠,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③这种名士风流的行为实际上是遗民们的一种文化策略,相比明末社团的激进与斗争,清初的结社者们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在坚守文化阵地的同时也对旧朝的失败进行着理性的反思,更重要的则是在对以往审视之余,对往昔美好道德和文化秩序碎片化的追慕与重构,这种更为理性和淡定的结社给吴地的结社传统增添了崭新的人文内涵。

集会与结社的传统对于陈去病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面对清末统治者的腐败,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② 乾隆《震泽县志》,卷三十八。

③ 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先妣节孝君倪太孺人行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17页。